

然，就是韦诞生前不借，死后掘坟也要把这本书弄到手。

曹操好言劝说钟繇不必如此执着，一本书求不到何必这样折磨自己。钟繇听后从床上霍然坐起，急切地说道：“饭可以不吃，人可以不活，但书必须得到。如果这部珍宝得不到，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曹操看钟繇难以劝下，就找到韦诞，说服韦诞把书借给钟繇，韦诞仍然驳回了曹操的面子。钟繇没有得到书，这件心事久久不能放下，就在一些朝阁小事上处处让着韦诞、时时讨好韦诞，逢年过节都要备上礼物去探望韦诞，从不再提借书的事。一连数年，钟繇每年如此，虽不明言，韦诞心如明镜，终于被钟繇的执着感动，主动把书借给了钟繇。

钟繇得到韦诞的书，高兴地饭都顾不上吃，通宵达旦，连读了三天三夜，依照此书指点，刻苦练习书法，终于成为书法大家。

（作者杨应甫：长葛市文化局创作员、民间文学作家、戏曲作家。）

获明弘治帝朱祐檜“钦敬”的黄侍郎

黄侍郎，名杰，字士英，今长葛市古桥乡黄岗村人。明朝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中举，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登进士第，历任济南府推官、福建道监察御史、陕西左参政、顺天府尹，累官通议大夫，诰赠三代。积劳成疾，请退不允，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七月二十七日卒于京城官邸。杰发迹贤科，任职三十余载，历经中外。其官八迁，耀光风纪，誉满京畿。下达民情，上裨国计，持身恭慎，奉职勤能。闻公之言，如见肝肺，说说者清，悻悻者避，僚友悦服，圣上钦敬。杰公归天，国家折一栋梁，帝甚悼之。遂降旨辍朝三日，亲撰祭文，遣官照皇陵模式在黄杰故里延秀岗上选址建墓越级厚葬。至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五月二十九日，墓茔落城，皇上命皇太子率皇亲国戚，六部九卿与京城百姓恭送黄侍郎輿榱荣归故里，明孝宗朱佑檜遣钦差河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王洵及礼部官员在新落成的敕修黄侍郎墓地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幡旌悼幛，祭文挽诗，素服白花，铺天盖地，哀乐阵阵，悲声凄凄，钦差大臣宣读御祭文，礼部官员献爵酌浆，称得上中国封建历史上非常罕见的葬礼。

一家忠烈的邢国玺

邢国玺，字韞斯，别号瑞石。他为人厚重质朴，胸怀宽广而有气度，颇有古君子遗风，始终坚持忠孝大节，以忠诚待人，人也不忍心欺辱他。他癸酉科（崇祯六年——1633年）中举人，甲戌（崇祯七年）科登进士第，出任山东潍县知县。他先安抚百姓，然后才着手办理催粮征款这些政务。他为政宽和，与民休息，独独不放过那些鼠窃狗偷的宵小之徒。他常说：“小偷小摸不禁止，任其发展下去，就会成为啸聚山岭的绿林大盗；这些危害一方的强盗若不及时剿灭，必然就会更加猖獗，祸乱国家。如今，像秦晋这些贼寇（按：指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祸害中原地区，就是前车之鉴啊！”他做知县刚一年，就把潍县治理得道不拾遗，户不夜闭，百姓安居乐业。潍县县城以前是座土城，国玺上任以后，就捐出自己的俸禄将城墙修建成砖石，又开挖了护城壕，壕里灌满了水，城防固若金汤。当时群盗蜂起，相邻州县相继失陷，只有潍县城防安然无恙。后来转任府衙的户曹（掌管籍账、婚姻、田宅、杂徭、道路等事）主持军队的草料场，尽职尽责。再后来晋升为镇守登州、莱阳海防僉事，领兵海上，专门负责保卫百姓的安宁。他实行了许多加强防务的措施。诸如，施行屯垦用来储备军粮，发动辖区百姓广泛开展练武以备朝廷征兵，惩处罪大恶极的坏人以巩固后方安定，严禁以罚钱代替刑罚用来激励官方正气，关心邮政事业，革除积弊，使转运官物，传送文书的邮路得以畅通……诸项大政都成绩炳然。

壬午（崇祯十五年）年冬天，闯贼围城，他不分昼夜率领军民守城，备极辛劳。不久，又奉兵部的命令增援省城，他立即率领部卒五千人抵达省城济南，督军让他分出一半人马保卫鲁、衡两家藩王，又命他率领余部立即赶往登州。他率领几十骑人马东进，行到龙岗地方，突然遇到反贼的先头部队，他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刚开始时双方死伤相当，反贼人多势众，重重包围了官军，战场上刀枪交加，邢国玺身中刀箭十多处，坠落马下。反贼见到他的衣着相貌，就知道他是个当官的。于是，就逼迫他投降，国玺仰天大呼，叫骂不绝，被贼众杀害在临胸（地处山东半岛中部，今潍坊市西南部）的野外。战后寻找他的尸体，几乎辨认不出来了。他的三儿子邢为枢哭天喊地，找寻其父的遗体，终于找到了其父生前所用的发簪，因此认出了

其父的尸体。

邢国玺的事迹上报朝廷，朝廷赠授他光禄寺卿（朝廷九卿之一），特赐公祭国葬，功荫一个儿子进入国子监读书，邢国玺的灵牌入祀乡贤祠。国玺的妻子袁氏为丈夫殉节而死。长子为法，次子为宪都在为保卫长葛县城（崇祯十四年）而战死。清康熙年间，长葛县的知县何鼎痛切地感到他们一门忠烈，死于国事，作长歌吊之。邢国玺两儿坚守长葛城，城破宁死不屈。

邢国玺长子为法，次子为宪，都是饱学的青年。当初，贼众攻破禹州时，杀戮百姓十分惨烈，邢为法的家仆哭着向他报告说：“贼寇人多势众，早晚就会来攻，长葛仅剩一座孤城是抗拒不了的，咱们不如早日逃跑。”当时为法正带领他的同为文学的弟弟邢为宪与孝廉孟良屏、李青芝、明经黄朝聘等人激励民众誓死守城，就喝斥他的仆人：你们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大义。等到贼众四面合围之后，为法等人分头守卫。有人暗地对知县说：事情危急了，投降可以免死。知县就缒城而下，带着县衙的大印来到贼营，哀告贼众说：我本人想开城迎降，怎奈主张坚守的人是孝廉孟良屏和登州、莱阳海防僉事邢国玺的儿子。贼众十分恼怒，就下令锯了许多大树堆集在已经干涸的城壕里，马上集结队伍，其势不可阻挡。贼寇进入城里，大肆烧杀，这个时候，众人都失魂落魄，为法、为宪还在督促仆从李明十几个人下城与贼巷战，杀死数名贼人。很快贼寇大队来到，把他的仆从全部杀死，为法和为宪也身受重伤。贼人头目传令要捉拿主张守城的人，众贼就簇拥着为法和他的弟弟为宪来到贼人头目面前。贼人得知这两个人的父亲是在山东做官的，就逼着两人拿金钱赎命，邢为法说：“我父亲是位清官，哪里会有银子？”贼人声色俱厉地说：“你父亲是清官，难道就没有几百两买命钱吗？”贼人勒索愈急，法、宪兄弟始终都没有答应。稍后贼人得知了他们兄弟二人都精于骑射，就把利刀架在两人的脖子上，胁迫他们投敌。为宪大骂：“恨不能生嚼你们这些狗东西以谢全城父老，岂能当个投降将军？”遂即咬断舌头，满口喷血。贼人大怒，将他们捆绑拷打了一天一夜，惨毒万状，而最终两人也没有一句软话，兄弟二人同时遇害。为法的妻子李氏也顽强抗争，殉节而死。为宪的妻子董氏，脖子上连中数刀，却没有死去。法、宪兄弟死后，贼人询问当地百姓，百姓们都说邢国玺居官清正，为乡亲们做了许多好事，家里根本没有余财。贼人听后，也很后悔误杀了好人，于是马上传令不许焚烧邢家的住宅。

评曰：青衿学子，没有必然死国的责任，明明知道逃走就能活命，留守就会战死，终于不肯逃离，这是他的天性刚直，所以当他处于生死关头时就

没有什么彷徨犹豫。噫！朝廷命官，责在守土，却存心从逆，曲膝媚贼，而学生士子却奋不顾身，城破家亡，固然出于为国御贼的义气，然而身无功名的一介书生，为何却能如此？听说为法从前在潍县时曾经模仿信国公文天祥《正气歌》的形式，写出过一首诗歌，言辞甚为壮烈，诗中就有死忠尽节的句子。当时曾经有人惊讶于他的夸张，谁知竟然一语成讖了，生命也是追随着性格的！当他挽起衣袖与贼众拼死决战时，那些没有向敌冠发过一箭而存活下来的人，见到这种情景，应该惭愧得死都来不及了！苟颜偷生与慷慨就义，谁得谁失，必然会有能辨别出来的人，这就是忠义死节之士能够名传千古的缘故啊！

邢国玺夫人、两媳一孙女沉水自溺

袁氏：都察院副长官左副都御史邢国玺的妻子。国玺与流寇作战时战死，儿子邢为法、邢为宪守城不屈而死。袁氏同二儿媳董氏、三儿媳高氏，并带着十多岁的孙女从山东回长葛老家，刚走到曹州府，遇上土匪，百姓争相逃命。家人禀告她：事情很紧急，咱们逃往别处。袁氏不慌不忙地说：“等得到贼人确切的信息再决定不迟。”于是就同两个儿媳闭门不出，家人多次催促，才知道婆媳三个都已经上吊。家人打破窗子把她们救出来，假意安慰她们说：贼人离咱们还远着哩，何必这样呢？袁氏呵斥他们说：“你们的主人为国战死，我岂成苟且偷生？我宁可在贼人到来之前先死去，也不能等贼人到来后屈膝求生！”于是就举火自焚，家人将火扑灭后，她又拿刀刺向自己的脸，血溅满身，衣服都成了红色。家人知道袁夫人必死的志向不可夺，于是就听任袁夫人偕两个儿媳一个孙女直奔寓所后边的深潭，袁夫人还恐怕死后尸体漂浮起来，就让儿媳、孙女各自在身上绑上石块，投水而死。丫鬟和仆妇跟着她们投水而死的有好几个人，知县张东俊详细写出了她们壮烈殉夫的情况，申请朝廷进行表彰。

长葛民众的磅礴气节

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长葛县城被李自成农民军攻打，长葛民众进行了顽强的守卫，城破，许多民众被杀。这里仅择其主要的领头人而简述：

孟良屏：字旭六。他性情恬淡，不计名利，钻研学问，爱好书法，丁卯年被荐举为乡贤。他的父亲年过六十才生下良屏，以前，其父曾收养过一个螟蛉义子，良屏善体乃父恩义，厚待义兄，田产和义兄平均分享。他和睦亲族，周济邻里，乐善好施，人皆敬仰。长葛遭受叛匪的滋扰，良屏激励乡亲们分城拒守，屡次挫败贼寇攻城的阴谋。辛巳年（崇祯十四年）长葛县城被反贼攻陷，良屏和贡生黄朝聘等人同时被贼人抓获，拒不降贼而死。

黄朝聘：字莘起，青城知县黄家才的大儿子。他勤奋好学，少有大志，累次应试都能取得很高的名次，戊寅年（崇祯十二年）以贡生得中举人。朝聘性情至孝，其母生病，他亲自煎药，自己尝过之后才让母亲服用。母亲亡故，朝聘悲哀过度，几乎死亡。他乐善仁厚，每遇灾荒之年，都出钱养活生计困难的朋友，邻里乡亲被他救活的就有数百人之多。崇祯八年（1635年）闯贼第一次围攻长葛县城，他分守西城，出奇招屡次挫败贼寇锋芒。辛巳年（崇祯十四年）城破，朝聘与许多守城人被贼人虏获，他们慷慨不屈，骂贼而死。其时，巷战冲锋，骂贼而死的官绅士民足有五十余人之多，这也足以见证长葛民众为儒教所鼓舞起来的气节是完全可以用于保卫家园的。其中有姓氏可以记载的有：张范孔、曹一俊、张振翊、武崇文、李应宾、侯玺、朱之鼎、朱之屿、李又琦、李文培、李正芳、李正彧、李紫芝、吕家修、邢为法、邢为宪、孙之昌、孙麟定、时运昌、张善法、刘志先、冯士髦、张忠荃、张谦吉等，可惜不能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了。

杜甫与长葛

路志纯

近来整理长葛文史资料，在清康熙三十年的长葛县志中录有一首杜甫的诗，全诗如下：

九日示两儿

唐 杜甫

令节成吾老，他时见汝心。
浮生看物变，为恨与年深。
长葛书难得，江州涕不禁。
团圞思弟妹，行坐白头吟。

这首诗引起我的兴趣，于是查阅了相关资料，原来唐代大诗人杜甫与长葛确有一些联系。资料显示：杜甫有五首示海二子的诗：《宗武生日》、《熟食日示宗文、宗武》、《又示两儿》、《元日示宗武》、《又示宗武》。杜甫有两个儿子，长子宗文，次子宗武。他的《熟食日示宗文宗武》、《又示两儿》——即清康熙三十年长葛县志所集《九日示两儿》为杜甫因“安史之乱”避难至成都时的公元765年，杜甫54岁时所作。

这一年的寒食节，因不能回老家河南巩县扫墓而深感悲痛，且又思念流寓长葛的两个弟弟和流寓江州的妹妹而写下的诗作。

“九日”是这年的寒食节。寒食节这天严禁烟火，只能吃寒食。在冬至后的一百零五天或一百零六天，在清明前二日。相传，春秋时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大臣介子推曾割股啖之。重耳做国君后，大封功臣，独未赏介子推。子推便隐居山中。重耳闻之甚愧，为逼他出山受赏，放火烧山。子推抱木不出而被烧死。重耳遂令每年此日不得生火做饭，追念子推，表示对自己过失的谴责。因寒食与清明时间相近，后人例将寒食的风俗视为清明习俗之一。

杜甫有四个弟弟，杜颖、杜观、杜丰和杜占。杜颖，据《杜甫年谱》所载，曾在山东临邑任管理文书、簿籍、印鉴等工作的主簿一职，在杜甫写

这首《又示两儿》诗作的前一年，即公元764年杜甫五十三岁时，“弟颖往齐州”。这说明杜甫获知了大弟弟的确切信息。而最小的弟弟杜占则随杜甫落脚成都。在此前两年，即公元763年的11月杜甫“将出峡为吴楚之游，于是命弟占归成都检校草堂”。由此可知，流寓在长葛的是他的二弟杜观、三弟杜丰，且书信往来很是困难。

杜甫只有一个妹妹，嫁到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丈夫不幸早年去世，留下孤儿寡母，又遭战乱，从这首诗来看，又流落到江州——今江西九江。

另外，杜甫在同一时期还有一首《晦日寻崔戢、李封》的诗作中提到长葛的始祖葛天氏，诗中有“上古葛天民，不貽黄屋忧，至今阮籍等，熟醉为身谋”这样的诗句。是作者在“草牙既青出，蜂声亦暖游。思见农器陈”发出“何当甲兵休”？的感慨后抒写了他崇尚上古葛天氏时的“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的和平生活，而不像作者一样被天下纷争所害，漂泊异乡；羡慕阮籍等“竹林七贤”，可以对酒长歌，“放浪形骸”，无忧无虑地过日子。

至于杜甫的两个弟弟杜观、杜丰在长葛的情况以及他们后来同杜甫往来情况，还有杜甫同长葛的其它资料尚无看到，希望识者能有新的发现。

（作者路志纯：见《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到黄河集团公司视察》注。）

白居易与长葛和许昌

路志纯

唐代传世诗作最多的大诗人白居易白乐天，与长葛有一些瓜葛，但并不为世人所熟知。近来，我在整理长葛文史资料时，读到清康熙三十年长葛县志中有关白居易的遗迹的记载和诗文很多，仅在第八卷·《艺文志》里就收有《改建白乐天祠像记》、《白家村·白乐天故里》、《满庭芳·白乐天祠》等七篇（首）文章、诗、词。

那么白居易究竟同长葛有些什么瓜葛呢？白居易的出生地在河南新郑县东郭里，时在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年2月28日），这是为文学史家所熟知的。但他母亲也就是他的外祖父家是长葛的并不是许多文学爱好者所知晓的。

白居易的外祖父陈润，长葛人，陈寔后人。曾任陕西郾城县令。白居易之母由于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之功，被封为颖川县君。白居易为他父亲所写的《襄州别驾府君事状》中这样叙述他的母亲：“夫人颖川（长葛历史上的县名——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设置）陈氏，陈朝宜都（按陈朝：南北朝时南朝最后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陈武帝陈霸先为颖川陈寔支系。宜都：陈朝陈后主的五弟、宜都王陈叔明。陈叔明3世孙陈兼为唐玄宗时进士，官秘书少监，翰林学士）之后，考讳润，坊州郾城县令，乐天之外祖也。夫人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颖川县君”。白居易因其外婆家在长葛，所以从他出生到12岁，就在长葛、新郑的自己家和外婆家居住、走动。12岁那一年，因避战乱，全家迁移到徐州。

白居易喜欢饮用长葛陈孝仙所酿之酒，陈孝仙曾教他酿酒的方法，白居易晚年在《池上篇并序》中说：“先是颖川陈孝仙与酿法酒，味甚佳。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秋思》，颓然自适。”

我一友人张松桥近日研究白居易与颖川陈氏之姻亲关系时，发现大诗人白居易说自己是“葛天之遗民”。见《全唐诗》第459卷第035首，《白居易集》卷六十九·《不出门》，该诗全文如下：

弥月不出门，永日无来宾。食饱更拂床，睡觉一嚔伸。

轻箠白鸟羽，新簟青箭筠。方寸方丈室，空然两无尘。
披衣腰不带，散发头不巾。袒跣北窗下，葛天之遗民。
一日亦自足，况得以终身。不知天壤内，目我为何人。

很多人都知道，长葛是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的葛天氏的故里，长葛者，古人希冀葛天氏时代的“不言而信，不化而行”和谐生活长久之意也。当然，本人认为，“葛天之遗民”也并非实指他就是“长葛之后人”，更多的似是泛指，也就是说，白居易说自己是所憧憬的葛天氏时代的那样美好的生活状态下的一个“遗民”。但他写出这样的诗句，毕竟同他在长葛生活过不无关系吧！

今长葛市西南7公里处有一小村庄，叫白乐宫，遗存有白居易墓冢、白乐宫（白居易祠）。宫墓西有“白居易生前居住的“白云楼”遗址，据考证确系唐代之物。宫前河上石桥称白乐桥。据省、长葛县志载，白乐宫于明万历七年知县聂启元、三十七年乡民康大臣、清康熙二十六年生员李均衡相继倡众重修，规制为三进院祠宫。长葛县知县刘大观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岁次乙未季春”立“唐太傅白居易故里”碑至今尚存。

还要提及的，是白居易同许昌的关系。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白居易32岁时，其三叔白季珍任许昌县令时，白居易到许昌探望叔父，撰写了《许昌县令新厅壁记》。因其不为读者所多见，故全文录之：

民非政不*（无法查考），政非官不举，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为用，故古君子有虽一日贝梯其墙屋者，以是哉。许昌县居梁、郑、陈、蔡间，要路由于斯，当建中、贞元之际，大军聚于斯，兵残其民，火焚其邑，大田生荆棘，官舍为煨烬，乘其弊而为政，作事者其难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选署颍邑令，于是约己以清白，纳人以简直，立事以强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简直故，狱讼不得留于庭；以强毅故，军镇不能干于县。由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储蓄邦之本。”命先营*仓。又曰：“公署吏所宁。”命次图厅事。取材于土物，取工于子来，取时于农隙，然后丰约量其力，广狭称其位，俭不至陋，壮不至骄，庇身无燥湿之忧，视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而举，民由是而*。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不韪之哉？呜呼！吾家世以清简垂为貽燕之训，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坠，小子举而书之，亦无愧辞。若其官邑之省*，风物之有亡，田赋之上下，盖存乎图谍，此略而不书。今但记新厅之时制，与叔父作为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修，屋壁无纪，前贤姓字，湮泯无闻。而今而后，请居厥位者，编其年月名氏，自叔父始。时贞元十九年冬十一月一日记。

清代及清之前长葛的父母官

许凤召

在古代，人们习惯称治理百姓的地方行政长官为父母官。这一称呼，生动形象又简洁地道出了地方官员的神圣职责，和老百姓对地方官的信赖和期望。

自秦行郡县制以来，治理长葛百姓的父母官，恐怕会有一大群。他们都是什么样子？可惜作为一县之长，无论在任何时代，他们在庞大官僚群中都是微不足道的一芝麻大的小官。国史上几乎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今天我们想了解他们，惟一的途径就是看地方志书。长葛的地方志，最早的是明朝正德年间的《长葛县志》，而后，在顺治十三年、康熙三十年、乾隆十二年 and 民国十九年又续修了四次。这上面对长葛地方官的记载，明以前了了无几，明以后比较详细。但从记述内容上看，绝大多数只是循例列名，只对极个别政绩卓着者，才略记其宦绩。

隋朝的房彦谦，可以说是今天能知道的最早的长葛县令。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唐代贞观名相房玄龄，他就是房彦谦的儿子。房彦谦原来是秦州总管录事参军，他曾同当局高级行政长官高颖讨论研究“考课法”，考课法也就是朝廷考察官吏的办法。他的见识深得高颖的钦佩。后来，他被调任长葛县令。他将长葛治理得很好。朝廷派员巡查州县官吏政绩，结论是“房彦谦天下第一”。结果他被越级提拔为郡州司马。离任时长葛老百姓嚎啕大哭说：“房明府离开我们，我们怎么生存啊？”可见老百姓很拥护他。长葛人为他立碑颂德。后来他辞官回家时，家里一贫如洗，他却怡然自得。他对儿子玄龄说：“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清白耳！”后来房玄龄成为一代名相，这可谓他继承并发扬光大了前辈的光荣传统，“子肖其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宋代三百多年，长葛的父母官只记下乐京、李若谷、江滋三位的名字。惟李若谷记了一件小事。说是“李若谷在任长社尉时，州里要建兵营，派老百姓交纳木材，长葛自然由他负责。他是县尉，当然不会坐收，自有手下小官吏们操办。这些收木材的小官儿们，便利用这点小小权力趁机以权谋私，欺诈百姓。咋欺诈呢？就是总说老百姓交的木材不合格，给退回去。有

道是谁有权谁说了算，长短粗细扁圆弯直，说你不合格就是不合格。什么才算合格呢？钱来就合格。原来他们是以此逼索贿赂。李若谷得知此情况后，想了个办法，他按照州里规定的木材规格，亲自用尺子量出了长短大小各种样品，摆放在大庭广众面前，让老百姓比照这些样品交纳，使那些逼索贿赂者没了可乘之机。千年之前的李若谷竟也懂得增强行政透明度！

元朝崔杰在至元甲子（公元1264年）为长葛尹。去任后，长葛民众为他立下一块“崔公去思之碑”。碑文中记他两件具体事。一件是：当时长葛的户口比郾城少得多，而朝廷所规定的差役负担竟和郾城相同。这在当时是极不合理的。崔杰来到长葛后，既不怕有违上命，也不怕前任难堪，亲手将实际情况与要求写成文书上报，终得上司“除减均一之命”，长葛百姓受益不少。再一件事是：老百姓每年都要交纳造做军器的物料，可负责这事的部门和官吏们长期在斗和称上做手脚。此事沿习已久，本可以听之任之。可崔杰不是这样，他要铲除这一积弊。那时又没有“标准计量局”专管此事，他只得冒着犯众怒丢官帽的风险，亲自到负责这件事的部门，亲手校验他们的斗和称。掌握真实情况，如实向上司报告，终于得到解决，使其他县也同时受益。

元代还有一个长葛尹叫赵志。他在任时看到长葛城南一带，地势低洼，多湿地，下雨积水，往往成灾，他便亲手教高朗等到人种稻子，早了再引颍水灌溉。结果，水利和种水稻受益面积达三百多顷。遥想当年教百姓种稻子，不可能是朝廷给他的“硬指标”，他之所以这样干，可能是源于对“父母官”这个称呼的理解和敬重。

明代三百多年，长葛父母官列名者80位。记有宦绩者有洪武年间的林庸、焦裡、田深，嘉靖年间的有王奇、张贤、孙濡，万历年间的冷文煜、杨应春，天启年间的聂明楷，崇祯年间的李在公。可惜多为虚言概括，少有实绩记述。这里只说聂明楷。

聂明楷，四川剑州人，号伊思。他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任长葛知县，三年任期中，力求减去老百姓许多粮税，把原来借口损耗加征的所谓“火耗”也免掉了。他经常表彰勤恳劳作的人，批评教育游手好闲的人。他见长葛文风不盛，就捐出自己的俸禄修了文昌阁，振兴文教。他见石象一带地势低洼成灾，他亲自倡导并率领百姓开渠30里，使水向东南归于颍水。而他自己勤奋俭朴得像普通老百姓一样，无论三教九流、牧童老叟，都可以与他亲近交流，他都会坦诚相待，让你一眼看到他的光明的肺腑。为他写碑文的人发感慨说：“可悲的是，现在有许多地方官，做一任地方官，像住一回旅店一样，虚饰政绩，应付局面，心里根本就没有老百姓。所以老百姓眼

里，官场就像秋后连一片枯叶都没有的枝条一样，一点也不值得关心。政治腐败日益严重，浮华虚假之风日益严重，实在是由此而来。在这种环境中，像聂明楷这样的让百姓依依不舍、梦寐以求的官员，太少了。”

清代二百多年，县志列名父母官 61 名。略记宦绩的有：康熙年间的米汉雯、李元让、何鼎、刘大观，雍正年间的胡文元，乾隆年间的阮景咸，嘉庆年间的邹蔚祖，咸丰年间的顾恩培，光绪年间的周云、朱名炤。

上述诸位中，李元让和何鼎让长葛人最难忘记。长葛民众不仅为他们立了碑，而且又给他们建了祠堂，将他们当神敬！这是为什么呢？

李元让，江南山阳（在今江苏淮安山阳县）人。康熙二十二年（公元 1683 年）上任时，城东北康恤保一带，大约为今大周镇，一半为沙岗土岭，一半为低洼积水，旱也不收，涝也不收，水患尤其严重。原来也曾修有沟渠，因年久失修而淤塞。这里的老百姓很想修整，总因势单力薄，群龙无首，茫然不知所措，只能仰天长叹。

李元让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到这一带观察测量，制定计划。然后召集百姓聚会，给百姓讲兴修水利的意义和具体做法，连深浅宽窄长短尺寸都讲得清清楚楚。然后组织施工。怎奈当时正值荒年，百姓吃不饱肚子，怎么干那么重的活儿呢？等到来年吧，又怕再多受一年的害，李元让就捐出自己的俸禄赈济他们。他几乎每天到工地视察督促。见有不合格的地方或见有人操作方法不当，就操起工具做给他们看。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疏通开挖沟渠 11 条，终于使这里“变沧溟为桑田，辟污莱为膏腴”。功成后，他还骑马来到这里，在树荫下与百姓共同饮酒庆功话家常。他常对人说：“既为国为民，须任劳任怨，何屑屑于人为！”可惜，这位李大人在长葛三年任期未滿，竟因劳累过度而卒于任上。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死后清理他的家产，竟然“家徒四壁”“宦囊如洗”，他的两个儿子竟拿不出把他们敬爱的父亲的柩枢运回山阳老家的路费！还是长葛的民众凑钱把这位为长葛鞠躬尽瘁的父母官的柩枢运回了老家，入土为安。

长葛民众深深怀念这位李大人，在双洎河之东岸，为他修建了祠堂，并请他生前的好友、密县知县衷鲲化写了《邑侯李公祠堂记》。

接任李元让的是何鼎。何鼎湖南靖州人。他在长葛兴义学，育人才，每月初一、十五到学校讲课，无论寒暑从无间断使长葛学子上进之风大进。他在任期间，康熙庚午年（公元 1678 年）秋，双洎河遇到一次大洪水，他就亲自带领百姓加高加固河堤，后来几十年双洎河平安无事。因为他在长葛干得好，深得老百姓的拥戴，所以他一直干了两任六年，被朝廷提升为户部主

事，迁兵部郎中，后又出任安庆知府。长葛民众为他建了“生祠”。他离开长葛36年后，他的儿子何经文做了贵州安顺知府，进京经过长葛曾拜谒父亲的祠堂。而又36年后，他的孙子何熠做河防兵备道，巡视开、归、陈、许四郡，又来到长葛，于是何鼎“善人有后”便被世人传为佳话。

邹蔚祖，江西南城人。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岁饥，饿殍载道。他开仓设粥厂两处，一处东关岳庙，一处西关玉皇庙，两处相距三里许，他每天两次往返其间，亲自点验人数和粮食数，严防有人中饱私囊。后来连仓里的粮食也吃光了，他又捐出自己的钱余粮三百余石救济饥民。这位爱护百姓的邹蔚祖，从“职官表”上看，他在长葛干了三任九年，足见他深受老百姓爱戴。

清代末年，也就是整个封建时代的末日。就是这时候，长葛的两任知县潘守廉和江湘，成为封建王朝灭亡的象征。先是光绪三十三年，潘守廉被长葛民众控告去任，接着，宣统元年上任的江湘，又因为派款逼得长葛百姓怒砸大堂而去任。江湘去任后，也许是再没有好官可派了，又派被长葛民众控告而去的潘守廉回长葛任知县。日益觉醒的长葛百姓也不能再容忍他，不久又把他赶走了。

中华民国建立了，毕竟比封建王朝进步了。这里所说的进步主要指社会进步了，人民进步了！作为一县的父母官倒看不出多少进步。志书所列的民国十四年前的13位父母官中，何毓琪被控告离职，同时被罚洋3000元办工厂；洪宝焘被控告免职，同时被罚款4000元余仓谷；李楚珩被控告免职；吴汉嵘因贪被控，藉差而逃，最后被杀；张全铭被历史钉在“阴险贪毒媚权害民”的耻辱柱上。其余多数只列其名，惟独对苗德屋略述政绩。说他民国二年为长葛知事，性情坦诚无城府。当时土匪猖獗，苗德屋亲率民团与土匪作战。土匪的枪弹击碎他的马鞍，他在地上滚着督战，终于将土匪击溃，保护了百姓。民国三年，上级命令检验各种契据契约，因此各地都需筹款。别的地方大多乘机搜括，从中渔利，官吏衙役趁机拉拢钻营，贪赃的事多得很。可苗德屋在长葛县“独持大体，不事吹求”，节约用费上万计。后因公务过失去职，长葛老百姓到开封省政府请求为他复职，未被批准。他罢官后，家里很穷，就靠教人读书过活。

粗读县志所载，不难看出，作为父母官，凡关心爱护百姓，为百姓办实事者，哪怕是一星一点，都被百姓记在心里，使他名垂青史。否则，人们遗弃他，甚者，遗臭万年！

（作者许凤召：曾任长葛县史志办公室副主任、市文联副主席。）

李燕标传略及其抗英事迹考

袁耀坤

李燕标，字京魁，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系今董村乡西吴庄村人。

燕标生于农耕之家，自幼习武。年长，身材魁梧、体态奇伟，品格出众，膂力过人。24岁中武举，28岁赴京会试，未中。经拣选以千总之职录用。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在河南巡抚营中任职，道光元年（1821年），升任提塘。道光五年（1825年）接任京提塘事务。道光十一年（1831）任浙江处州守备。道光十二年（1832年），升任平阳都司。道光十七年（1837年），奉旨充任温州镇标右营游击（清代武官名。从三品，次于参将一级）。同年，浙江提督委其护理提标中军参将（秩正三品，位次副将，掌理本营军务）印务。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国侵略军进犯镇海、宁波等地，燕标奉调阻击英军先头部队。他身先士卒，奋力搏杀，终将英国侵略军逐出宁波，为恢复浙东失地立下赫赫战功。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卒于温州任所，归葬原籍，享年57岁。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鸦片战争开始。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英国侵略军从广州乘船沿海北犯，八月初到达大沽口外。道光皇帝见此情景，慌了手脚，立即派直隶总督琦善同英军谈判。结果，英国撤军南下。道光皇帝遂降旨将林则徐撤职查办，改派琦善到广东同英军谈判。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初，战争又起。六月，英国派璞鼎查协同侵略军总司令兼海军司令巴加，率10余艘军舰和4艘武装轮船，载炮230门，再次北犯闽浙沿海。八月，厦门失守后，英国侵略军约3万人，乘29艘军舰入侵定海。当时，署理两江总督、掌理苏、赣、皖盐、漕、河三大政务并节制江浙军务的主战派裕谦，指挥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和王锡朋，率兵5000余人，同侵略军浴血奋战6昼夜，歼敌1000余人。终因装备落后，三总兵英勇牺牲，定海再度失陷。

定海失陷后，英国舰队兵分两路进犯镇海。裕谦登城督战，城破殉节。定海、镇海、宁波失守后，道光皇帝于十月派奕经为扬武将军，从江苏、河南等省调遣兵员1万多人，决心收复所失三城。十二月初，奕经到苏州后，

借口筹备军务，驻扎三个月之久而按兵不动。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三月初，他仓促下令在一天之内三路进军，企图侥幸一举收复三城。因军机泄露，敌人有所防备，进攻开始不久，便被敌人击溃。副将阿木穰率领一支藏族部队约100余人，冲入宁波西门，遭到英军伏击，全部壮烈殉国。

奕经失败后，英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郭富，率1200余人，分乘三艘武装轮船和数十只舢板，自宁波溯江而上，进犯慈溪等地，遭到清军迎头痛击，死伤无算。连英人当时也承认：“自入中国以来，此创最深。”

李燕标任温州游击时，正值英国侵略军先后四次侵犯闽浙沿海之际，温州位于浙江南部海岸，防务相当紧迫。直至英军攻陷浙东三城之后并继续西犯时，他才奉命调到宁波前线迎敌的。据李燕标的墓志铭记载：“道光二十二年，宁波遭夷（英）匪为寇，公奉上宪扎调赴军营，攻打头敌。公身先士卒，不避艰险，以平宁波之乱，诚可谓有智有谋、忠勇兼全者矣！”所记载的这段文字来看，他不仅作战英勇，而且有“平宁波之乱”中的战功。他奉调御敌的时间，只有年份，没有月日。若与史实核对，他与英军交战的具体时间当在奕经失败之后。因为他当时是浙江提督所辖的地方武装部队，奕经败走，他们仍在原地坚持战斗。他“身先士卒，不避艰险，以平宁波之乱”的壮举，是在道光二十六年六、七月间英军主力北犯进入长江口之后，当时英军留部分兵力于宁波城中，作为地方部队就利用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抓住战机，英勇奋战，将英军击溃，收复了宁波。早在100多年以前，帝国主义第一次武装入侵中国的时候，长葛县就有一个身为中军参将的军官，“身先士卒”，御寇立功，的确是值得我们敬仰与怀念的！

（作者袁耀坤：教师，曾任长葛县地名办主任、县政协副主席。）

清末翰林杨佩璋轶事

袁全印 供稿/刘书宾 整理

杨佩璋，字筱村，今后河镇后河村人，生于咸丰庚戌（公元1850年）正月二十六日。佩璋幼年父母早亡，随伯父丙昌——浚县教谕任上攻读。由于他刻苦认真，诗书文章共进，同治癸酉（公元1873年），考中拔贡第二名，甲戌（公元1874年）朝考一等第一名，钦点七品小京官。光绪丙子（公元1876年），乡试第二十六名，复试第八名，正式中举，次年会试第二百三十四名，复试二等第五十名，殿试第二甲第七名，朝考二等第二十八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三年（1877年）改授翰林编修。1920年春末，大病卧床，拒绝服药，七天时间，命归九泉，终年七十岁。

杨佩璋一生，少年壮志，为官清廉，关心群众，乐善好施，给人们留下了一串串美好的回忆。

少年奇才

杨佩璋幼年时，其母张氏久劳成疾，终于睁着望子成龙的双眼离开了人世。杨佩璋只得随伯父任上读书。一年之后，其伯父得知家乡县试，即送侄儿回乡赴考。考试那天，佩璋与县东大周考生李启宇同进一个考场。李，大周名门之后，在东半县有文章“甲天下”之誉，五岁就读通《四书》，此次考试，各考客皆言魁首非李启宇莫属。

评卷中，县太爷与诸考官实难判出杨、李试卷的等级。怎么办？礼房师爷献策：“试卷同等，再比智慧！”第二天，县衙之内立一青竹，青竹之上挂一纸鸟，主考宣布：“二位的文章，同属优等，今在此以智较量，最后定夺第一，二位意下如何？”二童生点头称是。知县宣布口试题目：“青竹之下埋有何物？”李启宇环竹一周，回称：“竹下埋有铜器。”“怎讲？”“此乃‘到凌云处亦虚心之说，竹子虚心，‘迎气’谐‘铜器’，因此竹下埋有铜器。”杨佩璋答曰：“竹上一鸟，实为凤凰，常言道凤凰不落无宝之地，这竹下必埋有元宝。”知县命人搬倒青竹，果见一元宝随竹根露出地面。知县当即宣布杨佩璋为今年县试案元，李启宇为第二名，上报许州。喜报也很快

报到杨府，少年奇才，誉满乡里。

为官清正

清末的科举由于上京举子多，交通不便，京城不易容纳，因此实行分道考试。江南举子多，行贿者更多。故出任江南道主考的人选问题，太后着实费了心思。她有意翻看上科试卷，看到杨佩璋所评的文章，那有关他的人品、传闻、捧印、退兵、以及多次提出改革考试方法，以利取士……又浮现在眼前。遂召兵部右侍郎、内阁大学士杨佩璋进养心殿见驾。太后说明召其来意后，笑而问之：“杨爱卿此去江南有何打算？”“臣愿以耿心履行职责，竭力达以考风纠文风之目的，定将栋梁之才献于社稷，不负太后厚望。”太后听罢大悦，“放卿江南主考，三日后离京。”

离京前，副主考邵以廉府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而杨府门前却挂着“上朝未归”的牌子。

赴任途中，杨佩璋除随身物品外仅带皮箱两只，里面有太后赐带的折扇百把，如能把扇顺手送人，回报的将是万贯家业。佩璋一行虽绕道而行，但仍躲不开沿途官府的热清款待，他们力尽东道之谊，借机攀附。顾面子的以购扇变相行贿，厚颜之徒则公开在居室摊摆银两、字画、古董，无奇不有。佩璋警诫左右，凡居室一草一木，损一赔十，吃饭住宿，公平交易，折扇不得出手一把。而邵以廉居室的字画、古董等一扫而空，车向江南去，财向京内流。

江南下榻之后，杨佩璋一连数日足不出户，进见人员一律回避，一切考务均在其策划下秘密实施。

三场考试，杨佩璋除严格考场纪律外，并以“学而时习之”、“学而实习之”、“学而优则仕”三道路边试题，使大部分无真才实学的纨绔子弟手足无措；而愿青天来临，主持公道，实现平生抱负的饱学之士的才能得以施展，为国家选拔了英才，纠正了文风，受到西太后的嘉奖。

为民解难

后河镇刘士华村民刘树勋，世代以开染坊为业，家境殷实，他时刻牢记祖训，不忘周济乡民，因此偌大生意却无多少积蓄。

是年，京城来一姓张的客官，声称承揽宫廷一切印染，特来乡下买蓝

靛，以保证皇宫所需。忠厚老实的刘树勋热情招待，几经说合，仅收十分之一的定钱，即把自己所有的蓝靛送到了京城。

初到京城，虽有茶饭款待，但一连数日，张却对货款只字不提。后来刘一天天发现自己已经由座上宾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银钱用完，又一天天风餐露宿，树勋终于大病卧于客店，眼看病入膏肓。一天无意中听店家说杨翰林为人耿直，嫉恶如仇，乐善好施，深受太后器重。树勋听到这个消息，急忙从床上爬起，说明求救之意，请店家帮忙。后来在店家协助下见到了杨翰林。树勋说明来意，杨佩璋安慰道：“靛钱包在我身上，气可就要靠你自己消啦！”热情的款待及承诺立即使树勋病好大半。

次日早晨，用过早点，杨佩璋交待树勋：“现在你就去姓张的柜前要账，我不派人去接，不要离开店门。”树勋刚到柜台前，就遭到姓张的恶言斥责，并让伙计将树勋推出门外。天黑了，星星眨着眼一颗颗蹦了出来。树勋蹲在店门一侧，想起了一家老小，对星长叹，好不伤心。忽然，一盏写着“杨”字的灯笼由远而近，一闪一闪来到店前停下，那掌灯人并不和树勋答话，便举手拍门：“我家老爷有请张掌柜！”店伙计把门打开，掌灯人特意举起灯笼，问道：“我家大人的亲戚早上就来要帐，为什么直到现在未归？”这时，他将灯笼门前一照，故作惊慌，“哎呀！你怎么蹲在这里，怎不叫大人着急呢？”说罢，并不与店伙计罗嗦，拉着树勋径直回府去了。

第二天早上，树勋还没起床，就听到门外有人高喊：“刘老板，请到大门外清点银两！”树勋走出府门，只见张客官磕头如捣蒜，恳求树勋转告杨翰林高抬贵手，不计小人之过。树勋让张请起，并安慰他一定转告大人，请他放心回店。

从此，刘树勋逢人便说：“翰林爷的灯笼救了俺全家呀！”

（口述者袁全印：见前注；整理者刘书宾：教师，曾任长葛县一小教导主任。）

中共长葛党史人物——霍树中

郝顺才

霍树中，又名信卿，字云浮，一九二三年在开封省立一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经冯品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长葛县中共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共青团荥阳县双楼郭支部书记，中共许昌特别支部书记。中共许昌特委军事委员等职。一九三〇年十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一九三一年二月八日在开封英勇就义，时年仅二十六岁。

(一)

一九〇五年二月，霍树中出生在长葛县城东南双树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霍普兰，曾在县教育局任职，为人正直，但收入微薄；母亲张氏勤劳善良；俭朴持家。全家人仍以种田为生。霍树中兄妹四人，他排行老大。尽管生活艰苦，但读过书的父亲仍将儿子送进附近私塾学堂。幼小的霍树中深知读书不易，就用心听讲，勤奋努力，很快便读完了《四书》、《五经》。塾师看他聪明伶俐，在课外还经常给他讲一些历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使他受到了爱国思想的熏陶。

一九二〇年春，霍树中考进了新式学堂——长葛县蚕桑学堂。时值“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潮也冲击到了长葛。霍树中在新学堂里大开了眼界，求知的欲望更加迫切。一九二二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省立第一师范。在一师，他首先得到了进步教师徐光（后加入共产党）的关怀和指导，在思想上和学习上取得了进步。一九二三年初，共产党员冯品毅来省立一师，以英文教员的公开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冯品毅经常深入到青年学生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和要求，给学生讲当前形势，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在自己住室的外间，开辟图书室，购买《新青年》、《向导》等革命书刊供大家阅读。二月，冯品毅亲手创建了河南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省立一师支部，并任书记。在冯品毅的亲切指导下，不少青年进步很快，思想觉悟也大大提高。不久，霍树中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军阀吴佩孚镇压而失败。霍树

中回到长葛，组织县第一高级小学等校的师生举行集会，声援工人的正义斗争，讲述京汉铁路大罢工斗争的经过和军阀镇压工运的罪恶。在校长高宜亭的配合下，县城有四百余人参加了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这次斗争也是长葛第一高级小学最早的一次政治斗争。

三月，为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旅大主权，全国人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运动，三月十六日，开封各校学生举行大游行，省立一师团支部是领导这次斗争的核心。霍树中与同学们一道，积极组织和参加游行示威，并手执写有“还我故土”、“誓死力争”等标语，在开封街头散发。这次斗争，曾被当时国内各报报导，影响较大。

不久，霍树中邀集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讨论革命青年的理想，探讨革命理论。并与其他同学共同创办了《溶金》壁报，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撰写和发表文章，宣传进步思想，抨击时弊，在校园内颇有影响。在暑假，他还带回一些进步书刊，让家乡的青年朋友阅读，经常给朋友们讲外边形势和当前的重大问题，引导他们深入思考，倾向革命。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河南青年也从“五四”时期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梦幻转向革命救国上来。他们首先组织志同道合的人，建立革命团体。一九二四年春，在冯品毅和进步教师嵇文甫等的直接帮助下，霍树中和同学韩沅波、刘英、裴光等发起成立了“青年学社”，以反帝反军阀为口号。以后，霍树中还和在中州大学附中学习的同乡孟炳昌、李友三联系，成立中州大学附中青年学社小组，后来还成立了分社。青年学社成立后，一方面号召社员积极调查研究，经常开会学习讨论革命问题，并注重对外宣传，还成立了书刊贩卖部，出售省内外进步书刊。同年，经冯品毅介绍，霍树中和刘英、韩沅波等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他在校学习成绩优秀，可他父亲还是获知了霍树中在学校参加了革命活动，非常担心他惹出是非。一再写信要在开封的亲戚代加严管，霍树中根本不理乎父亲这一套。参加共产党后，他便一直沿着自己要走的道路前进。

(二)

一九二四年寒假，霍树中与孟炳昌、李友三根据团组织的要求，利用假期回到长葛进行社会调查，并到县蚕桑学校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团员汪涤源取得联系，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学生阅读他们带回的《向导》、

《共产主义 ABC》、《唯物史观》等书刊。他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批驳了学生中流传的“均贫富”、“盗贼”就是社会主义的谬论。他说，社会主义就是要把“现在的经济组织全部推翻”，把各种生产要素一概归之为公众，象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建立劳农专政，使人民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霍树中深入学生，了解他们的思想和要求，先后发展了进步青年黄梅岭，高玉杰、崔南山、樊丙鉴、谢南松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主持建立了党小组，由黄梅岭、高玉杰任组长。

二十年代初期，河南广大农民为反抗兵、匪骚扰，纷纷建立了以保家自卫为主的武装组织——红枪会。霍树中通过关系深入长葛红枪会，想方设法接触红枪会上层。经过他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使部分会首和会员初步脱离迷信，使这股自发的武装力量逐渐走上革命的道路。一九二五年初，霍树中先后发展孟排寨红枪会首领马胜军、胡青田，二郎庙首领刘政文、刘自修、石桥路路林东、段庄段开勋，石固杨庄杨景贤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尽管他们后来都有不同的变化，但在使红枪会组织向农民协会转变、配合武汉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霍树中不愧为长葛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做好红枪会上层工作的同时，霍树中和黄梅岭、高玉杰等共产党员深入农村，特别是红枪会会众中，教育他们谁是贫苦农民的敌人，使广大农民认识到只有自己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反对地主的剥削，官府的苛捐杂税和军阀土匪的骚扰。接着，霍树中在一些条件成熟的乡村，改造红枪会为秘密的农民协会，先后成立了石桥路、段庄、孟排、二郎庙、石象等村农民协会。

一九二五年春，霍树中帮助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长葛县党部。九名共产党员担任县党部委员，并在霍树中具体指导下进行革命工作。

“五卅”惨案发生的消息传到开封，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立即发动各界声援斗争。霍树中和孟炳昌、李友三受中共组织派遣回到长葛，发动、组织和领导长葛各界群众开展反日、英帝国主义和爱国斗争。六月中旬，长葛县立中学师生与县城各界群众共同举行了集会并游行示威。霍树中在集会上进行了即席演说，他号召大家一定要把这场爱国运动进行到底，提出了“不买日货”“取消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游行示威后，霍树中还与其他共产党员一起领导各界群众开展了一次查禁仇货和募捐活动。县学生会的同学分编了许多查货募捐小组，走遍县城和乡间各大集镇，边查洋货边搞募捐。县商务会会长王瑞桐从外地运回一批英国产白糖二十余车，被学生会查出，决定予以罚款。王瑞桐贿通军阀驻

军营长范西海，以势欺压学生，抵制反帝斗争。为了打击奸商，反对军阀，推动反帝爱国斗争，霍树中带领学生与范西海、王瑞桐展开了直接斗争。范西海见学生不肯就范，又怕酿成大的群众运动，就乖乖地交出十五元作为捐款，而后溜之大吉。学生会罚王瑞桐一百五十元。不几日，学生会募捐得来的三百余元一并汇至上海，捐给蒙难的工人和学生。

(三)

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共豫陕区委成立后，为了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农民运动的号召，派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分赴各地搞农运试点，霍树中和胡伦、唐士奎、马士俊等先后被派到荥阳县的水磨、双楼郭、贾峪一带开展农运工作。据当年的农协会会员回忆，霍树中（当时叫云浮）那时风华正茂，热情奔放，文思敏锐，谈吐大方，分析问题明了透彻，并且平易近人，大家十分愿意和他接近，交流思想，提供情况。他随身带有一部留声机，在双楼郭村，每天晚上播放梅兰芳等名家的唱段。霍树中利用这个机会，与当地农民拉家常，向群众宣传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的意义。经过他们的发动、组织，双庙、水磨等区、乡农民协会纷纷成立。

霍树中在双楼郭期间，还担任了共青团支部书记。他注意和重视对青年农民的宣传教育工作，先后在双楼郭、双庙等村设立青年俱乐部，举办夜校，并亲自任教。教青年农民学习文化，同时也灌输革命道理。他亲自订阅十余份《中国青年》杂志，在青年农民中传阅。他还教入夜校的农民唱革命歌曲《少年先锋队歌》、《国际歌》以及《打倒列强》、《可怜中国人》等。通过这些歌词来启发青年农民的思想觉悟在祖始庙小学，霍树中和胡伦与该校教师杨西平一起建立了少年先锋队，经常帮助学生解决思想问题和学习问题。他还组织学生进行课外活动，开阔学生们的视野；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宣传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在他领导下，双楼郭一带的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荥阳县农民协会在双楼郭镇正式成立。胡伦主持了成立大会，肖人鹄、霍树中等分别讲了话。到会的有各区、乡农协代表，还有来自长葛、登封、密县京汉铁路工会等单位的代表。大会通过了《荥阳县农民协会章程》和《荥阳农民协会宣言》。胡伦担任县农协委员长。这时，荥阳县共建立了七个区农协，六十八个村农协，会员总数达一万五千多人。荥阳县农民协会是河南省第一个县级农协，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北方地区最早的县级农民协会之一。它的成立，对于河南省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共青团豫陕区委组织部长张霁帆来荥阳考察时，对霍树中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在给团中央的信中，张霁帆说：“吾校在此工作曾开始不久，但所得成绩极好。凡加入农民会之农民，大多数均出于自觉自卫的观念，我们的一切主张，亦颇能使群众有真的了解，脱去豫地许多工会中的敷衍和个人政策的恶弊。此时未成立（农会者），各区农民正纷纷自动要求组织，并将原有之红枪会改编为农民自卫军”。十二月二十四日，张霁帆到双楼郭填后，当晚就召集团支部会议，听取霍树中的汇报和工作计划。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张霁帆也指出了他们工作的不足，并对今后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发展作了具体指导。

(四)

一九二六年初，霍树中离开了荥阳，到许昌开展农运工作。霍树中到许昌后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立即开展了艰苦的农运工作并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了许昌特别支部，支部有七人组成，霍树中任特别支部负责人。他深入到离县城三十多里的许昌、禹县、长葛三县交界处石固镇与郭靖宇、戴善同等一起发动组织农民进行抗捐抗税，抗差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在他任职期间许昌的农运工作发展颇快，先后建立了村农协会五十多个，全县有四区，会员五万三千多人。

一九二七年四月，北伐军逼近信阳，军阀吴佩孚为了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增兵南援，以阻止北伐军的前进。为了支援北伐军，霍树中亲自带领长葛县石桥路村的农民武装，在朦胧的夜色中，拿着铁撬、板子、钳子，榔头等工具，在京汉铁路和尚桥北边，毁坏铁路干线三节，割断电线数段。

一九二七年七月，蒋汪合流，镇压工农运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失败。河南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党的工作一度比较活跃的长葛、许昌一带笼罩着白色恐怖。为了保存力量，将党的工作由公开转入秘密活动。霍树中不畏艰险，不辞劳苦，组织力量继续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由于白色恐怖的日趋严重，中共长葛县委负责人黄梅岭被人告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押在开封第一监狱（后英勇就义）。不久霍树中也被县税务局长高已酉（大劣绅）告发不幸被捕（由于李友三等人的担保才被安全释放）。继而崔南山、谢南松等同志也被人告发，家庭被查抄，因此一些党员思想消沉，长葛党组织曾

一度陷于半瘫痪状态。

长葛匪首朱老三，杨老三乘机蠕动，到处抢掠绑架妇女，焚烧房屋，国民党政府视而不见，一些贪官也趁机搜刮民财贪污公款。对此，霍树中非常愤恨，组织共产党员，研究分析革命形势，鼓舞同志们的革命斗志，加强与民团的联系，进行剿匪，匪首朱、杨二人逃遁。对县长潘天林纵容包庇反动校长高寿臣吸食毒品，贪污公款，开除学生的罪行，给予坚决的斗争。霍树中亲自会同县城有关团体组成一个请愿组，前赴开封省教育厅告状，霍树中、周鼎（共产党员，时在教育局任职）为请愿组代表。霍树中等人的数次控诉，据理力争，迫使高寿臣被撤职查办，学校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请愿终于取得了合法斗争的胜利。

为了贯彻“八七”会议和中共“六大”精神，中共许昌党组织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在许昌西北司堂发动了农民武装暴动。中共长葛县党组织在霍树中的领导下，组织党员和武装农民前赴司堂参加和支援暴动队伍。由于原计划暴动时间的提前，结果造成暴动的失败，策应人员途中闻讯而返回。

三月末，河南省军政执法处派警察官张镒和密探队长程淑才到长葛将参加许昌司堂暴动的共产党员李友三逮捕，押往开封监狱。经霍树中等同志多方营救才被释放。国民党禹县县党部在石固镇又将共产党员郭安宇逮捕，并把郭转押开封，霍树中得知消息后，立即组织带领人员在途中营救，因郭安宇担心这样做党组织会遭到更大损失，执意不允劫案，结果营救没有实现。

(五)

一九三〇年四月，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将共产党、共青团合并建立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上级党组织派人到许昌中心县委工作，该同志（名字不祥）来到长葛与霍树中取得了联系，由于该同志单身独行，不便隐蔽。为了同志的安全，霍树中让自己的妻子化装结伴而行，送往许昌。

六月，中共许昌特支改建为许昌特委，并建立了军委，杨建民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刘晋任组织委员，霍树中任军事委员，刘仁、石文卓，宋延寿任委员，霍树中从此开始搞军运工作。秋末，豫中（许昌）特委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城乡建立灰色组织，“穷人会”、“游击队”、“少先队”等青年武装组织，经过霍树中的组织发动，军运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许昌、长葛都组织起青年武装，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运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惊恐，他们赶忙派出大批兵力和特务凶狠地搜剿，妄图扑灭刚刚燃烧起来的革命火

焰。在这紧要关头，霍树中不顾个人安危，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敌人的阴谋和罪恶，带领武装农民和党员，在那腥风血雨的岁月中，同反动势力展开斗争。

一九三〇年十月，中原大战以冯玉祥，阎锡山失败告终，蒋介石的军队占领了开封，他的嫡系刘峙被任命为开封行营主任、兼河南省政府主席。新军阀的统治对革命运动的摧残更加严重，他们采取“宁可错杀一百，也不错放一个”的宗旨，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十月，霍树中受党的委托前赴南京执行任务，途经开封时，被叛徒出卖，当即被捕。

霍树中身陷囹圄，却宁死不屈。敌人的残酷刑讯，也动摇不了他的革命意志。一九三一年二月八日，敌人将霍树中杀害于开封西关外。霍树中临刑前，一身正气，威武不屈，大骂刘峙，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周围群众无不感动落泪。时年，霍树中才二十六岁。

参考资料

- 1、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 2、中共河南省委党史《五卅运动在河南》。
- 3、《中共河南党史大事记》及《中共开封党史资料》。
- 4、《荥阳党史资料》第一辑。
- 5、马云生《旅苏纪事》。
- 6、河南省委党史编《一战时期河南农民运动》。
- 7、《长葛县一中校史》1959年。
- 8、崔南山、霍树勋、霍树廷、霍选、李瑞章、樊丙鉴、符元亮、孟庆云、楚书丽、杨西平等同志的回忆。

(郝顺才：长葛市党史研究室干部)

中共长葛党史人物——黄梅岭

李继亭 郝顺才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凌晨，黑云如山，腥风血雨笼罩着开封古城。刚刚出版的《河南民报》上，一则“昨枪决赤匪要犯记（吉）国桢等十四名”的消息，使市民们感到震惊和愤怒，进一步认识到当局的反动残忍。在同省委书记吉国桢一起牺牲的人员中，有中共长葛县党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的黄梅岭。

黄梅岭，字景先，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出生在河南省长葛县官亭乡田庄村一个农民家庭。祖父黄文星一生教书，文章名扬乡里，是当地有名气的学问人，父辈兄弟四人，其父黄子晏排行老大，一生务农。母亲刘氏勤劳俭朴，宽厚善良，终生不辍劳作。黄梅岭系长门长孙。无兄无妹，自然被全家人所疼爱，并对他寄予无限希望，盼他长大成人，兴家立业，光宗耀祖。他的祖父更希望长孙习文成名。在其祖父的关怀影响下，黄梅岭自幼聪明好学，博读强记，所学“四书”、“五经”皆能背诵，很受祖父及乡邻的喜爱和器重。

黄梅岭少年时期，正是社会风云变幻的年代，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清朝政府腐败无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人民开始觉醒。一九一九年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使黄梅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也在他心里播下了推翻反动势力，改革不合理社会制度的种子。正当黄梅岭发奋学习之际，他敬爱的祖父不幸去世，他为失去祖父极度悲痛。梅岭的母亲怕他为此影响学习，就让梅岭跟随舅父刘鹤鸣上学。

一九二一年，十四岁的黄梅岭约同本村黄丙辰等同学离开家乡，到许昌报考育德中学，黄梅岭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在育德中学，黄梅岭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启蒙读物，如梁启超等主编的《新民丛报》和康有为的《大同书》。对这些书籍他发生了极大兴趣，经常手不释卷，对民主革命思想，对为什么会产生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有了粗浅的认识，变革社会现状的思想开始萌动。一九二二年底，黄梅岭从许昌育德中学转到“长葛甲种蚕校”读书，这时的甲种蚕校由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校内进步空气浓厚。

一九二四年夏，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汪涤源、共产党员霍树中等一些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相继回到长葛，在甲种蚕校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还带回《新青年》、《响导》、《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让学生传阅。充满求知欲的黄梅岭对这些书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如饥似渴地进行阅读，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初步懂得了什么是压迫，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等道理。在霍树中、汪涤源的影响下，黄梅岭的革命觉悟不断提高，他积极参加学校里的各项进步活动，成为长葛甲种蚕校的骨干。

一九二四年冬，霍树中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同在开封一起学习的李友三、孟炳昌回到家乡长葛宣传组织民众，在进步师生中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这年冬，由霍树中介绍，黄梅岭和崔南山、高玉杰、樊丙鉴等进步青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长葛县的第一批党员。在霍树中的帮助指导下，随即建立了长葛县党小组。根据黄梅岭、高玉杰的表现和在学生中的影响，大家推选黄梅岭、高玉杰为党小组长。

一九二五年春，中共长葛党小组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和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决议精神，帮助建立了国民党长葛县党部，黄梅岭当选为商民部部长。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英、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野蛮屠杀中国工人游行队伍，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消息传到长葛，长葛各界人民义愤填膺。此时在开封求学的霍树中、李友三、孟炳昌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家乡长葛，发动各界民众开展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斗争。黄梅岭密切配合霍树中、孟炳昌在长葛的活动，组织学生踊跃参加，在甲种蚕校组织建立了“学生联合会”，黄梅岭任学生会主席。他带领学生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向各界群众宣传英、日暴行，呼吁各界民众，团结一致，打倒英日帝国主义，为被害同胞报仇。经过黄梅岭等同志艰苦细致的宣传发动，大大激发了长葛县各界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热情。在霍树中、孟炳昌、黄梅岭的领导下，长葛县城各校师生在甲种蚕校操场召开了声讨大会。黄梅岭在会上发了言，他愤怒揭露了帝国主义者逮捕屠杀我工人学生的暴行，呼吁全县各界人民团结起来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打倒帝国主义。黄梅岭慷慨激昂的发言，使各界群众受到了极大鼓舞。会后，在霍树中、孟炳昌、黄梅岭的带领下，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一时“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等口号响彻长葛县城上空。黄梅岭和学生们一起高唱起：

“天昏地暗沪江边。

英、日逞强权，惨杀我青年，
弹如雨、血如泉，
赤手奋空拳，尸横大道前，
此仇不共天，
野蛮大和魂，野蛮不列颠，
同胞莫忘，
五月三十民国十四年……”

这悲壮的歌曲，更进一步激起各界民众的反帝爱国怒潮。

七月广州沙基惨案的消息传到长葛，霍树中、黄梅岭等组织学生再次举行示威游行，学生们手执“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小红旗，沿街高呼：“取消英日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坚决不买日货”等口号。紧接着黄梅岭协助霍树中、孟炳昌领导长葛县群众以学生为骨干，在长葛开展了查禁仇货和募捐活动，黄梅岭领导学生会，将学生分为许多查货募捐小组广泛进行。在查货中他们规定，“所有仇货概行封存停售，个别商品可当场销毁。”这些规定得到大多数商民的赞同。商务会长王瑞桐运回一批英国进口白糖在和尚桥车站下车，他以为有权有势，学生奈何他不得，就照常运售。查货的学生非常气愤，黄梅岭等带领学生前往，宣布扣车，予以没收。王瑞桐贿通长葛的驻军营长范西海，企图以范之势压服学生。霍树中、黄梅岭等带领学生与范西海、王瑞桐展开说理斗争。在学生们义正词严的斗争下，王瑞桐，范西海不得不低头认错。最后，范西海拿出十五元灰溜溜地走了，王瑞桐被罚款一百五十元。学生们把罚款连同三百多元募捐款一并捐给上海、广州蒙难工人、学生。

“五卅”运动后，长葛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黄梅岭经常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向民众展开反帝爱国宣传。这年麦收前，县城南关外的郭庄庙会，热闹非凡，县文胜戏班也在庙会上演戏助兴，黄梅岭和学生会副主席高玉杰认为这是向民众做宣传教育的好机会。于是他们以学生会的名义，组成宣传队到庙会做爱国宣传。宣传队在黄梅岭的带领下来到文胜戏班演戏的地方，让他们停止演出，由宣传队进行爱国宣传，黄梅岭亲自登台演讲，他激动地说：“同胞们……我们再不能忍受了，不能让那些帝国主义者和卖国求荣的走狗、刽子手们任意枪杀和逮捕我中国人民了。起来吧！同胞们，赶快起来吧，举起你们的铁拳，来拯救我们的祖国，拯救自己的命运吧！”他的演讲使台下群众很受感动，爆发出阵阵掌声，响起“打倒帝国主义”的吼声。使听讲的群众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长葛地处中原腹地，军阀连年混战，给长葛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军队的饷银粮草及各种名目繁多的差役，全部压在农民身上，贫苦农民苦不堪言。黄梅岭对横征暴敛非常痛恨，曾多次发动学生向派车派粮的公差作斗争。一次黄梅岭和几个学生见到县衙的一个叫皮屯的公差，正气势汹汹地强迫一位农民出官车，这位穷苦的农民因家里穷没有牛车，便向公差苦苦哀求，公差仍强逼不止。黄梅岭早就恨透了这些家伙，见此情况分外愤恨，他和几位同学一涌而上，打得公差呼爹叫娘，跪地连声求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公差再也不敢在街上仗势欺压百姓了。人们对黄梅岭见义勇为的行为非常敬佩。

“五卅”运动以后，黄梅岭遵照党的指示，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当时，长葛一带由于军阀混战，散兵游勇、土匪恶霸互相勾结，打家劫舍，祸害百姓。全县许多村镇纷纷联合，成立农民自卫组织“红枪会”，抵御兵匪的骚扰抢掠。后来，不少红枪会组织被当地地主所控制。为争取改造红枪会，使之变为党领导的农民武装，一九二五年黄梅岭深入农村到城西孟排寨、段庄、二郎庙，城东石桥路、石象等地，利用各种关系，接近红枪会，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启发红枪会会员们的觉悟，教育感化红枪会首领，红枪会首领在他的启发教育下，提高了觉悟，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中胡清田、马胜军、段开勋、刘征文、路林东、周鼎等红枪会首，还被发展为党员，使党组织掌握了一定的农民武装。

一九二六年三月，直系军阀吴佩孚部的马吉弟师驻防长葛，其一切军需粮秣费用，全加在长葛老百姓身上，他们的兵差徭役，苛捐杂税非常多，钱粮提前几年预征。长葛人民深受其害。黄梅岭、胡清瑞组织党员发动学生和各界群众起来反抗，联名向四方通电，控诉马吉弟师的罪恶，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一次声势较大的反军阀斗争。一九二六年四月，在豫陕区委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共长葛县党支部，黄梅岭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

一九二六年夏，长葛十二保团总黄玉卿依仗职权欺压百姓，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民愤极大。黄梅岭和谢南松一起发动学生与黄玉卿展开斗争。根据黄玉卿的罪恶事实，黄梅岭同大家商量，捉拿黄玉卿治罪，为不使黄玉卿逃脱，把学生分成五个行动小组，分别把守五个城门。黄梅岭、谢南松率领部分学生到县衙捉拿黄玉卿。黄玉卿听到消息赶快藏了起来。学生们到处搜查，没有找到，便向县长要人，并提出两个条件要县长当场答复：一是撤掉黄玉卿县团总职务；二是废除不合理的摊派。在黄梅岭及同学的坚决斗争下，县长不得不同意了同学们提出的条件。

一九二六年冬，黄梅岭领导长葛党组织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开展了破除迷信、树立新风的活动。黄梅岭带领学生几天内就把县城和乡间一些大寺庙宇的神胎、偶像扒光，把腾出的房子全都作为小学校舍，在长葛城乡引起了强烈反响，认为黄梅岭他们做得好。

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央农民部为了加强对农运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在武昌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共豫陕区委派到长葛的农运特派员高介民，介绍黄梅岭、李芙镜、谢南松、陈子林等到武昌讲习所学习。黄梅岭在农讲所学习了《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民族革命史》等革命书籍。他还亲耳聆听了毛泽东讲授的《农民问题》和《农民教育》两门课，革命理论水平有很大提高。随着形势的发展，战时农民运动委员会四月在武汉成立。为了胜利进行北伐，战时农民运动委员会决定选派熟悉北方情形的宣传者百余人赴河南各地开展宣传工作。正在武昌农讲所学习的黄梅岭被选为战时农运委员会宣传员，一起随北伐军到河南农村开展工作。六月，黄梅岭随北伐军到河南开封暂住待命。在此期间，黄梅岭找到北伐军中的同事，时任国民党省党部常委陈泮岭，梅岭向他谈了要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的意愿。经过研究省党部指派梅岭回到长葛组建“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黄梅岭回到长葛后，经多方努力，于十月正式建立了国民党长葛县执行委员会，黄梅岭任执行委员，负责长葛农运工作。回到长葛后，黄梅岭把整个身心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和穷苦人在一起串连发动，很少回家，他母亲很为儿子担心。一天他母亲把他叫到跟前说：“景先呀，你也不小了，家里的事你很少管，只见你和那些吹糖人的、换针的、做小生意的（为掩护身份的共产党人）整天拉扯，有个啥前程哩？”母亲的心情黄梅岭是知道的，可这是党的秘密工作，不好向母亲说明，他连忙安慰母亲说：“娘您放心吧，我会走正道的，我和他们来往，是可怜他们是穷人，天下穷人要翻身，我要为穷人翻身干点事”。

一九二七年，武汉国民政府继蒋介石之后叛变了革命。长葛的革命形势非常严峻，长葛党组织负责人张檀调离，党组织虽未遭到破坏，但反动当局严令各保监视共产党的活动。为了加强党的组织，黄梅岭不顾处境危险，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组建了中共长葛县委，黄梅岭负责县委工作。九月中旬，河南省委召开会议，拟定了《河南目前政治与暴动大纲决议案》，确定十月十日全省举行大暴动。中共长葛党组织在黄梅岭的领导下，根据省委暴动大纲决议案精神，制定了以农民为主，在县西、县北两地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在黄梅岭的组织发动下，有三十七个村的武装农民起来向所在保甲的

首事和团总进行斗争，并解除了他们的职务，由农协会的领导人取而代之。黄梅岭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省委，受到省委的赞同，河南省委写信给长葛县委对他们组织的暴动予以肯定。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党”后河南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可黄梅岭仍然以旺盛的革命精神忘我工作。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因叛徒告密，省警察局派武装警察将黄梅岭逮捕，押解到开封。在审讯中敌人虽威胁利诱，施以重刑，但黄梅岭为了党的组织不受损失，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一点机密，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敌人无奈只好以政治犯定罪，关押在开封第一监狱。

黄梅岭入狱后不久，先后又有四百多名革命者也被关进了开封第一监狱。在开封第一监狱，党组织为了继续领导狱中政治犯同敌人斗争，建立了“难友会”、“党团干事会。”黄梅岭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同敌斗争，向宪兵宣传革命道理，开展政治攻势，使他们同情革命，他曾以交朋友的方式，做宪兵孙敬斋的工作，让他帮助传递消息。开封第一监狱大部分关押的都是政治犯，管理森严，为了使狱中党组织领导斗争的意见、措施传递到政治犯中，黄梅岭利用放风、上厕所的机会，写到牙膏皮上传给他们。当时，省委宣传部长谷迁乔也关在第一监狱，是党在狱中进行对敌斗争的主要组织者。黄梅岭经常设法和谷迁乔联系，开展狱中对敌斗争。为了避免更多的同志牺牲，狱中党组织决定举行越狱，并且规定了行动暗号，黄梅岭积极参加，不料叛徒告密，越狱计划失败。在狱中，为了鼓舞政治犯同敌人斗争到底，保持革命气节，黄梅岭参加组织政治犯高唱自编的狱歌，歌词大意是：

革命青年真勇敢，
一旦被捕了，不惧敌刑惨，
假若是无凭据，力争早脱险，
如若有物证，个人来承担，
坐狱家常饭，牺牲重泰山，
革命志士，视死如归，
流芳亿万年……

一九三二年，时任驻豫特派绥靖主任的刘峙疯狂地逮捕镇压共产党人，许多共产党员惨遭杀害。这时关押在开封第一监狱中的共产党政治犯因搞越狱活动被加重刑。黄梅岭是狱中坚持活动的积极分子，于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日，与省委书记吉国桢等十四人一道被敌人杀害。时年二十五岁。

（李继亭：长葛市党史研究室干部）

中共长葛党史人物——赵吉甫

郝顺才

赵吉甫同志于一九三〇年九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反帝大同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历任组织委员、武装委员、副县长、干部团副营长，情报分处主任，省地质调查所长，地质部储委主任、地质部地矿司处长、全国储委和省储委主任，省地质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等职，因身患重病医治无效，于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在郑州逝世，终年七十八岁。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赵吉甫同志为党、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赵吉甫，又名赵景星，赵瑞甫，一九〇九年九月三日出生在长葛县后河镇的一个贫农家庭，全家十四口人，有地十四亩，其中荒山地六亩、租种庙地一亩。全家人常年辛勤劳动，打下的粮食除交租外，所剩无几，还得靠父亲卖豆腐，叔父卖菜为生。尽管家庭经济困难，其父还是把他送进学堂念书。贫困的生活锻炼了吉甫幼小的坚强意志。深深感到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因此，学习非常用功。经“五四”运动和新思潮的影响，使他对旧的“五经”、“四书”学着不感兴趣，自己就毅然决然的投考了新学第二高小五年级插班生。这里的教师大多数都赞成社会的改革，学习内容、学校风气较为开放。教师不断地给学生们讲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孙中山的革命故事，使他幼小的心中埋下的革命种子，在思想深处开始萌发。吉甫想小学毕业后考取中学继续读书，将来好干一番事业，可是当时的军阀混战，兵连祸结，闹得千村薜荔，万户萧疏。吉甫终因家庭生活困难，辍学帮家中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生活的贫困、劳动的艰苦，使吉甫的求知欲望更高，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他时常焦虑、苦闷，心潮难平，扪心自问，中国的出路在那里？人民的活路在何方？眼看愚昧落后的贫穷，自己怎能荒废光阴，就想设法打通他父亲的思想，可做父亲的又何尝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多念书，只是家中生活困难，才让其辍学，看到儿子求学的心情，父亲疼爱器重，勉强同意儿子继续上学。吉甫征得他父亲的同意后，心情非常高兴，自己到开封投考，没有路费，就带上干粮，长途跋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私立嵩山中学二年级插班生。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彻夜不眠地苦读新书，阅读进步书刊，

在这个熔炉里陶冶着他的人生，探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进步师生的影响帮助下，使他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他心中逐渐树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给自己的革命道路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一九二八年河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农民协会相继成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百姓，纷纷起来响应号召，打土豪分田地，吉甫的家乡也有新的变化。农民协会的兴起荡涤了世上不平之事，吉甫打心眼里高兴，不断地回到家乡与伙伴们一起参加战斗，以极大的热忱向乡亲们进行宣讲党的革命理论，诱导群众起来革命。

一九二九年，赵吉甫的中学阶段学习将要毕业，可他去向难择！一天他们同宿舍的几个热血青年在一起谈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个个都激情昂然，愤愤不平，面对国民党政府到处搜捕共产党人，逮捕青年学生，更激起大家的公愤，他们清楚的看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时有人谈起河南大学的学生郭涤生，因为国民党政府指名要抓他，郭涤生跑到北平参加革命去了，赵吉甫听后喜出望外，心中荡起了波涛，暗下决心，要像郭涤生那样，到北平去参加革命，献身于拯救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毕业即将来临，他恨不得一下飞到北平去，马上写信家中要钱，说自己毕业后要到北平考师范学校，那里可以补助学费等等。结果家中只寄给他十二元钱，并说让他毕业后回家种地或教书。可是吉甫对家中的不支持并没有灰心，他一边迎接毕业考试，一边设法筹借路费，一天他找到河南医学院的老乡张世希借钱，并说明了借钱的用途。张世希很热情，也很慷慨地说：“你要多少？我这里只有五十元，你先拿去，我再给你写封信到焦作我父亲那里，让他再给你一些”，（张的父亲在焦作工学院是教授），吉甫很感激地收住了钱，但没有去找他的父亲，就匆忙地乘坐往北去的拉货敞车（不买票），约一个星期到达了目的地。到了北平，他首先找到了侯印书同学，（侯是民国大学体育系的学生）经他介绍在芑春园公寓住下。为了避免查户口的麻烦，吉甫报考了民国大学附属高中，录取后得到了住公寓的合法身份，暂时有了安身之处，在公寓认识了邱荫堂同学，（邱是河南博爱县人）和郭涤生是同乡，所以吉甫常到他屋里聊天、借阅书刊。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关系逐渐地密切，吉甫就向邱荫堂打听郭涤生的下落，并说明了他来北平的目的，邱荫堂听后非常吃惊说：“你这样盲目的找多危险那！若要遇到坏人你不就麻烦了！”随后他心平气和的说：“郭涤生最近没有来过，可我又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等他来了我通知你”。大约等了二十多天，郭涤生果然来了，见面后赵吉甫向他说明来意和要求，充分展示了他不凡的抱负，郭涤生对他那正直的性格和勇敢的精神很佩服，并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两人促膝的交谈了

思想，郭涤生临走时安排王家骥、邱荫堂二同志介绍赵吉甫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从此，他结束了学生生活，开始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生涯。赵吉甫和王家骥、陈建福、李森茂、邱荫堂等组织起来，编成一个团小组，以后不断沿街书写、粘贴革命标语，宣传党的政策。星期天到郊区大路口进行政治宣传，瓦解白军内部，使他们思想动摇携枪逃跑。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妥协让步的不抵抗政策，招致东北各省相继沦陷，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政治腐败深恶痛绝，北平进步师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讨伐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赵吉甫不顾国民党警宪的血腥镇压，走上街头自发地参加到爱国学生示威游行的洪流中。赵吉甫在束鲁县、晋县、深泽县担任团中心县委书记期间，他不畏强暴，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真理，以各种方式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了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吸收团结更多的青年加入团的组织，为地方培养了一大批抗日骨干力量。赵吉甫同志的能力和才干深受党组织的赞赏，于一九三二年春，经王家骥同志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赵吉甫受组织的派遣，第一批到门头沟、中央煤矿做党的地下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可到门头沟煤矿工作不久，党组织根据河北省委指示，决定派赵吉甫和一位姓李的同志，（名子不祥）到河南焦作福中煤矿公司工作，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开展矿工革命斗争。他们二人依照上级指定地点到焦作煤矿与党组织接头联系，此时正是矿山大罢工后的混乱局面赵吉甫和老李一直等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和组织取得联系，怎么办？两人商定，由老李一人先回北平向党组织汇报请示，赵吉甫因母亲病故回家探望等待老李同志的消息。

赵吉甫回到长葛后，一直没有接到老李的来信，可他也曾多次去信联系均未回音，他时刻惦记着自己的战友，担心北平的局势。他想返回北平，但又不知道那里的情况，使他心中不安，怎么办？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家怎能闲住，决心在家乡开展党的活动。赵吉甫同志首先托人在学校找到教书的职业作掩护，积极组织青年，宣传党的政策，在吉甫的努力下，使一时沉默的群众运动开始又有了生机。事隔不久经胡青田的介绍，吉甫认识了长葛县城西关住的辛玉衡同志，他是清末的一个穷秀才，深受旧社会的痛苦，为人思想开朗，敢说敢干，爱打不平，对打土豪分田地非常赞成，他的儿子辛金生，在他父亲的影响下思想也较进步，热爱人民，热爱共产党，吉甫和他接触，二人谈话很融洽，工作配合也很默契。频繁的交往，在辛金生的家

中，结识了不少的青年学生如李友三、李国璋、方柏松、路海阔、董金瑞、董书林、辛瑞芝等，和他们在一起讲北平和外地的革命斗争形势；讲“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领导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讲“二七大罢工”工人阶级的反抗精神；讲“五卅惨案”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中国人民和游行的群众，与全国人民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讲“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我大好河山的罪行等等激发他们的战斗热情，团结他们共同革命。

一九三五年二月（农历正月初六）赵吉甫在辛金生的家中召集进步的青年学生，共同分析研究了如何利用合法的斗争形式在长葛开展斗争，清除国民党在铁路以西的影响，向“八作会长”杨廷彦和反动区长徐中央作坚决的斗争，为开辟铁西工作铺平道路扫除障碍。会后大家分头发动群众，收集证据将他们吸食毒品、奸污妇女、强占民财、横行乡里的罪行由赵吉甫出面向县政府控告要求严惩，由于证据确凿群众要求强烈，才将杨、徐二人捆绑治罪，第一次取得了合法斗争的胜利。

一二·九运动暴发后，抗日救亡活动遍及长葛县城，在赵吉甫的领导下，长葛中学在“河南民报”上发表了声援北平学生运动的文章，县中的学生停课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

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加剧，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革命需要组织一支骨干力量，赵吉甫有的放矢的对青年学生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在条件不断成熟的情况下，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农历四月初八）组织召集陈伯瑾、辛金生、方柏松、董金瑞、董书林、李国璋、辛瑞芝等青年，在辛金生的家中成立了“读书救国会”，使这股革命力量，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为长葛的抗日宣传工作做出了贡献。

一九三八年日寇的铁蹄已踏入中原，豫东风雨飘摇，兵荒马乱，日军占领了长葛的邻邦尉氏县，长葛边境也不断受到骚扰，长葛县政府已迁入西山，贪官污吏都夹着尾巴逃跑了，在这荒乱之中，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负责人陈瑞图、赵吉甫等同志按照上级党的抗日指示精神，将一般的宣传抗日救国转入组织武装抗日，同时结合本县的实际情况下五月研究决定，由李思孝、陈瑞图、赵吉甫等人到崆山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一旦长葛沦陷，利用有利地形展开敌后游击战争，痛击日军。

崆山是长葛、新郑、禹县三县的交界地，比较偏僻，又是平原的唯一山区，这里设有不少的佛堂庙宇，经常有人来这里朝圣拜顶，来往人员复杂，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方。但从抗战开始到建立民先组织以来，这里的人民对

抗日是积极的。可是，也有一些民族的败类，或明或暗地煽动、破坏抗日，进行投敌卖国的活动，陞山寨南门里的一个庙道头子金老六就是其中之一，他勾结日本汉奸田金锡等收罗了十几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做帮凶，专门破坏抗日工作，为日军招募兵员，收集抗日情报，使民先队的活动、计划屡遭失败。民先组织负责人陈瑞图、赵吉甫已有察觉，经过研究分析，决定派人打入敌人内部，摸清情况消灭汉奸，扫除抗日障碍。可是要打入老奸巨滑的金老六的内部，不是一件容易事，要有合适的人选，派谁合适呢？在这方面，赵吉甫动了一番脑筋，经过了解观察，决定派胆大心细、身材魁梧的民先骨干队员敬子玉同志前往完成这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敬子玉和助手吕玉东接受任务后，几经周折，终于取得了金老六的信任。敬子玉很快摸清了田金锡与金老六的底细，立即找赵吉甫、陈瑞图汇报了情况。赵吉甫召集骨干认真地分析研究，决定抓住时机一网打尽，赵吉甫亲自带领组织的武装力量，敬子玉通过新郑县党组织武装负责人陈子山带人协助，统战委员陈伯瑾通知国民党长葛县党部南子平带人参加，统一行动深入金老六的巢穴活捉汉奸五人，反复查抄，都未发现田、金二人。后来探知他的狗腿发现了异常现象给田、金二人通了风报了信。两个狡猾的家伙闻讯提前仓皇逃跑了。这次虽然没有抓到汉奸头子，却鼓舞了人们的斗志，使陞山这块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六月中旬“郑荣密工委”派委员石井来到长葛与李思孝、赵吉甫联系，研究筹建党的组织工作，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于七月一日建立了中共长葛县党支部，李思孝任书记、赵吉甫任组织委员，陈瑞图任宣传委员。从此长葛党组织在这块土地上带领群众使刚刚燃起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

一九三九年二月，密县地委根据工作的需要，派杨长庚到长葛任县委书记，赵一凡任组织委员，赵吉甫改任武装委员，陈瑞图任宣传委员，陈伯瑾任统战委员，辛金生任青年委员，辛瑞芝任妇女委员。组织的健全使工作有较大的发展，党员队伍已发展壮大有党员七十多名。八月，县委根据上级指示，为了工作的便利派赵吉甫同志打入伪政府内部，夺取政权掌握枪支，开展合法的斗争。赵吉甫不畏艰险，迎着严峻的考验，克服一切困难。发挥自己善说巧变伪装的技能，又加上他在以前教学期间曾到郑州联保主任训练班学习过的优越条件，取得伪政府的信任。派他到和尚桥任联保主任，在此期间，有群众告发杨景贤的狗腿子李干卿吸食毒品，贪污钱财，无恶不作，李干卿曾扬言说道：“不杀穷人不富”的话，可见此人罪恶累累，是个地道的地痞大恶霸、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赵吉甫决定除掉此

人，抓住李干卿贪污公款、吸食毒品等犯罪事实，根据国民党《惩办贪污条例》送县治罪。李干卿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当地群众出了怨气，拍手称快，吉甫为民除了一大害，受到群众的热烈赞扬。

在长葛的会河村也有两个大恶霸，宋玉如和宋子栋，二人一个是能说会道，坏点子多，善于无事生非；一个是善书会写，笔尖杀人。二恶棍臭味相投，天生的一对坏蛋。二人还和洧川的大讼棍大恶霸马绍文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欺压百姓，丧尽天良，乡亲对他们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可谁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就连当时的区长翟慎修也不敢动他半根毫毛，遇事也要让他几分。翟慎修对赵吉甫除害一事有所耳闻，佩服他的胆略，有意推荐吉甫到会河担任联保主任。对这件事县委书记赵一凡亲自召开会议，大家共同认为，翟慎修调赵吉甫到会河是有他个人的目的，这次来个顺水推舟，让吉甫去会河既符合群众的要求、又顺从了区长之意，又能为民除害，又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所以党组织同意吉甫到会河任职，并且还给他派了蔡广录协助他的工作，使吉甫为民除霸的信心更足。赵吉甫到任后，一方面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一方面调查收集二恶棍的罪恶事实。据他初步了解，二恶棍在当地恶势雄厚，拉笼了不少地痞和打手，加之他在此盘据历史长久，对区长尚且不在乎，何况联保主任，他们更是不放在眼里。以前在此任职的主任，上任后，得先给二恶棍进贡请示，还得看二恶棍的眼色办事，如有一点不合二人之意，你就别想在这里干了。赵吉甫到任不买二恶棍的帐，可是二宋对吉甫在和尚桥为民除害的事也早有所闻，对吉甫的到任已有提防。赵吉甫到任后经过细致的多方调查了解，对二恶棍的罪恶已经掌握，但要想除掉二霸有一定的阻力，必须抓到他们的真凭实据才能动手，吉甫等待时机。这天终于来了，借宋玉如的女儿出嫁之日，吉甫便派人混入他的家中，把烟灯、烟具、大烟，老海等证据与二恶棍一起带到了联保处，可二恶棍的爪牙连夜又把二恶棍和证据一并劫走。赵吉甫根据国民党政府《禁烟毒条例》向伪县长汇报了二恶棍的罪恶，要求查封二恶棍的家产，限期归案，伪县长不得不同意吉甫的意见，出了告示限二恶棍三日内投案，如不按期归案，对其家产进行迫卖。二恶棍对吉甫早有所怕，便自动地按期归了案。伪政府根据二恶棍的罪恶事实给了他们应得的惩罚，投进了监牢。赵吉甫一时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了不起的人物，为民除害的英雄，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赵吉甫为民除害的事迹在全县广为流传，石固的地痞劣绅听到要调吉甫到石固镇任职的消息，便闻风丧胆，想抓吉甫的把柄。在他到任不久的一天，劣绅张丙臣就下了手向伪政府控告说吉甫是共产党员，但伪政府对吉甫